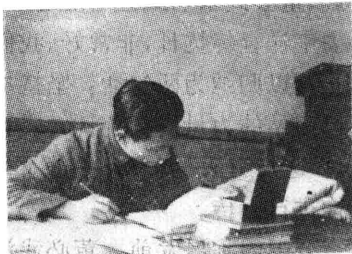


夏之秋与武汉合唱团



宁 静

(一)

1937年，震惊中外的“七·七”事变爆发后，中国掀起了全面抗战的热潮。当时，正在上海国立音专作曲系就读的夏之秋，结束了才进行了一年的学业，回到老家武汉，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去。

当时，冼星海、张曙、光未然等人都在武汉，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，成立了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。夏之秋参加了成立大会，并被推选为音乐组组长，全面负责音乐方面的宣传活动。夏之秋很快就在汉口和武昌组织起两支歌咏队来，四处进行抗日宣传活动。这便是武汉合唱团的前身。

这时，火热的斗争激情，也使夏之秋拿起笔来，谱出了一首首抗日的战歌！

1937年10月的一天，夏之秋在汉口出版的《大公报》上，读到光未然的诗作《抗日合唱》。



他反复吟诵着，铿锵的诗句点燃了内心的创作火花，他立即把它谱成了一首大合唱，改用诗的最后一句“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”作歌名。

这首有着强烈时代气息和艺术感染力的合唱曲，经歌咏队演唱后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。不久便刊登在当时全国唯一的抗战音乐期刊——刘雪庵主编的《战歌》上，很快便传到了大江南北。第二年，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拍摄追悼抗日将领郝梦麟的纪录片中，采用了这首合唱曲。那悲壮而又昂扬的旋律，增添了影片感染力。

处女作《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》一炮打响，使夏之秋的创作激情日益高涨，很快，他又写出另一首力作《歌八百壮士》。

这首歌取自以谢晋元团长率领的中国守军，坚守上海四行仓库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史实，由青年诗人桂涛声作词。由周小燕首唱后，很快流传开来。夏之秋遂把它改为合唱曲，使歌咏队又多了一首保留曲目。

此后，夏之秋与光未然合作，又创作了《女青年战歌》、《远征轰炸歌》等抗日歌曲。歌咏队在他的指挥下也越演越红火。

(二)

1938年，随着战局的变化，武汉也危在旦夕。夏之秋与队员们几经商议，决定赴南洋一带去宣传抗日，争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。在此背景下，武汉合唱团正式成立了。一些老队员因故不能前往，便招募了一些新团员。著名表演艺术家项堃便是其中之一。

行前，夏之秋见到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董必武。董必武亲切地握着夏之秋的手说：“你们要去南洋宣传抗日，非常好。我们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可以归纳为两句话：坚持抗战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；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。”这几句话，深深印在了夏之秋的心里，并沿途进行宣传。

合唱团临出发前，董必武派人送来了延安军政大学学生们生活、学习的照片，请他们在海外进行宣传。并交给他们一封信，请香港地下党的同志对合唱团的工作给予帮助支持。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，也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嘉奖。

1938年9月，由夏之秋担任团长兼指挥的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，动身离开了武汉。团员中，有工程师、银行职员、音乐教师、青年学生，他们怀着一腔爱国热情，集合在抗战的旗帜下！

(三)

路途的艰苦，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。当他们到达广州后，因战事紧张，虎门封锁了。他们只得先由水路到中山县，再由中山县乘车到澳门，从澳门乘船到香港。

一路上，他们走到哪里，便宣传演出到哪里。在香港，演了整整一个月。几乎所有的机关、单位，包括香港大剧院，都邀请他们去演出。夏之秋在此期间，又推出两首新作——《思乡曲》和《赠寒衣予负伤将士》。

说起《思乡曲》的创作，还有这么一个故事。合唱团到达澳门时，已是入夜时分了。夏之秋和团员们投宿旅店，纷纷告之客满。最后，一家小旅店还有一间客房，于是便让女团员们住下休息，所有的男团员便上街去“流浪”。

他们在街上转悠着，忽然一阵凄婉的胡琴声从夜风中传来。一位盲艺人在一个小姑娘的牵引下，蹒跚地走着。那如泣如诉的琴声，久久萦绕在夏之秋的心头。他想起沦落在日寇铁蹄下的家园，想起战火中颠沛流离的亲友……。一阵悲枪涌上心头，化为缕缕旋律。第二天，他把这段旋律记在了纸上，一位名叫戴天道的合唱团员，轻轻哼着，给它填上了四段歌词，并定

名为《思乡曲》。

《赠寒衣予负伤将士》是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创作的一首诗。合唱团在香港演出时，廖梦醒将母亲的这首诗作交给了她在沪江大学的同学，合唱团副团长黄椒衍。夏之秋将它谱好后，当即便在香港进行了演唱。

(四)

1938年12月中旬，武汉合唱团来到了美丽的岛国——新加坡。

当时，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在那里组织了一个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，并任主席。这个组织负责将华侨捐赠的大批财物输送给国内，支援抗战。合唱团早在香港演出时，便派出了先遣小组与他们取得了联系。

安顿好后，夏之秋便去拜见陈嘉庚，陈嘉庚热情地接待了夏之秋，并表示将大力支持合唱团的活动。为此，委派了筹赈会的两位秘书——潘国渠和黄奕欢来照料合唱团的生活和演出。在筹赈会的安排下，合唱团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。

1938年12月18日晚，合唱团在“星华各侨团学校”组织的欢迎大会上“首次亮相”，引起轰动，观众和各报章交相赞誉。12月22日，他们正式在新加坡的卡必都戏院公演，一连8晚，场场满座。在市民的要求下，合唱团在此又加演了8场。

此后，合唱团在新加坡的“大世界”、“新世界”、“快乐世界”三大艺场轮流演出。直到1939年5月，开始转到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。除了合唱，在项堃的导演下，合唱团还演出了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扬子江暴风雨》、《三江好》、《人性》、《雷雨》等音乐剧和话剧。

无论到哪里演出，合唱团总是带着自己印制的歌篇，分发给观众。每次演出结束时，都是全体观众和合唱团员们一起高唱抗战歌曲。歌声，把炎黄子孙的心熔铸在一起！

华侨们对于合唱团的募捐演出，反应非常热烈。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，还是在偏僻的渔港，每当演出完毕，观众都争先恐后地拿出捐

款。仅在马来亚巡演的第一站柔佛，合唱团就募得币40万元。在麻坡的一次义卖演出中一只花篮曾卖得20多万元。在马来亚各地的巡演，都由当地华侨工商界知名人士带头认捐，演出时以捐款最多的一人之姓名为“××先生之夜”或“××女士之夜”。

合唱团在马来亚巡演一年，共筹得捐款叻币200多万元，折合当时国币近2000万元。这些捐款连同在新加坡的演出门票收入，都交给了筹赈会。团员们每天只有两角钱的零用钱。可他们感到自己的获得是难以计算的。这群年轻的知识份子深切地感到：当个人与祖国和时代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将不再渺小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，他们献出了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！

(五)

可是，武汉合唱团的南洋巡演，给这里留下的影响，还不仅仅是这些……

在马来亚，曾有一位6岁的小女孩，把妈妈给她买午餐的零用钱全部捐给了合唱团，饿着肚子一遍又一遍地听他们演唱。1939年7月，筹赈会举办了纪念“七·七”事变两周年的义卖活动，这位小女孩随姐姐一道，拿着花，唱着潘国渠、夏之秋专为这次义卖活动创作的《卖花记号》，上街义卖。歌声，在她年幼的心中播下了热爱祖国的种子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她毅然回到祖国，成为一代著名歌唱家。她，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副教授，五届、六届人大代表叶佩英。而《卖花词》，一直是她经常演唱的曲目。

一位名叫黄源尹的华侨青年，闻说合唱团的活动后，独自从印尼苏门答腊家中跑出来，找到夏之秋，希望加入合唱团。但是，合唱团的活

动已将结束，夏之秋便对黄源尹说：“要爱国，就要回到祖国去，和祖国人民一道共同奋斗！”黄源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随夏之秋回国后，在周小燕父亲周苍柏的资助下，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，成为一位著名的歌唱家。

爱国的情怀，艺术的力量，不仅打动了千千万万华侨，还打动了肤色不同的外籍人。新加坡总督开初曾对合唱团抱怀疑态度，后来，他渐渐被感动了。一天，日本领事跑到总督府，抗议合唱团的活动，总督把他给顶了回去。

合唱团在马六甲的一个城市——麻坡演出时，一对英国夫妇观看了他们的每场演出并捐款。后来才得知，那位先生是当地一位官员。想不到的是，那位夫人竟用杭州方言对夏之秋说：“我曾在贵国的杭州留过学，你们的城市，你们的国家非常美丽，我也非常同情你们的遭遇，祝你们的抗战事业早日成功！”

长风万里远送客，海水盈盈溢深情。1940年5月中旬，合唱团启程回国了。在中国抗战史上，武汉合唱团留下它光荣的一页！

而夏之秋创作的抗战歌曲，也被列入历史歌曲名作而载入史册。《思乡曲》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的保留曲目，台湾电视连续剧《几度夕阳红》也采用了它作为背景音乐；《歌八百壮士》选入了台湾小学音乐教材，并成为台湾拍摄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。1988年，上海晋元中学的学生们在学唱了这首歌后，给夏之秋写来了激情洋溢的信；《卖花词》在新马一带继续传唱着；《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》也是中央乐团合唱队的保留曲目之一。这些抗战歌曲，还被选入不同版本的歌曲集里。它们以强大的艺术生命力，至今还感染着人们！

责任编辑 旭东